

文化背景与劳动力转移

——基于发展模式与文化背景的国际比较分析

张 勇¹, 古明明²

(1.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2.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北京 100009)

摘 要: 如果农业生产采用规模化的生产方式、工业化采用资本密集型的发展模式以及不重视对教育的投入作为一个整体会导致“劳动力转移的陷阱”, 从而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如何突破“劳动力转移的陷阱”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稳定发展的关键。而工业化、教育和农业发展的模式不仅仅受自然资源、投资、政策等经济因素的影响, 一些非经济因素, 比如社会文化价值观、对于劳动的态度等文化因素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文化背景很可能是亚洲和拉美选择了不同的发展模式从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发展后果的原因, 也就有了不同的劳动力转移后果。

关键词: 劳动力转移陷阱; 资本密集型工业化模式; 农业生产率

中图分类号: C92-0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8)06-0038-06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Labor Force Transfer: Based o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ZHANG Yong¹, GU Ming-ming²

(1.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2.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State Council,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The combination of scale production of agriculture, capital intensive development mode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neglect of investment to education will result in labor force transfer trap, and further lead to a vicious circle of development. Therefore to break the labor force transfer trap has become the key to development of almost all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modes of industrialization, education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re not only affected by economic factors like policies, but also by some non-economic factors, such as socio-culture value, attitude toward working, these and other cultural factors have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Chances are that cultural background is the reason behind the different development modes taken in Asia and Latin America, which led to the distinct development consequence and the different labor force transfer.

Keywords: labor force transfer trap; capital intensive industrialization mode; agricultural productivity

一、研究背景

农业劳动力的转移问题是每个国家工业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成功的农业劳动力转移可以带来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而不

当的农业劳动力转移不仅严重制约了经济发展, 还带来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尽管东亚和拉美都进行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 农业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但东亚一直稳步发展, 农业劳

收稿日期: 2008-02-18

作者简介: 张勇(1975-), 山东济宁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和发展理论。

动力较顺利的向工业部门转移，城市化进程稳步的推进，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奇迹”^①。与此同时拉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快速的城市化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贫富差距严重，发展严重不均衡，居民生活条件恶化。

关于这方面以前的研究基本上是基于人口迁移对就业和收入的影响，而且主要针对国际的人口流动。马尔和西科乐斯 (Marr and Siklos)^[1] 利用加拿大 1962 到 1990 的数据分析了就业和移民的关系，发现 1978 年前移民对就业率没影响，而 1978 年后则影响显著；他们进一步利用加拿大 1926 到 1992 年度移民数据证明移民对失业有冲击^[2]。拉耶 (Laryea)^[3] 分析了外国移民对收入的冲击，发现移民对收入有正的影响；弗里敦 (Feridun)^[4] 发现移民对瑞典、芬兰等国人均 GDP 有正的影响而对失业率没有影响；莫雷 (Morley)^[5] 则对澳大利亚做了类似的研究。齐格勒 (Zeigler)^[6]、黎波曼 (Lieberman) 和邵尔 (Shaw)^[7] 等则分析了政府政策、福利水平以及经济状况对移民的影响。在国内，李仙娥、王春艳^[8]，以及姚程^[9] 等对拉美和东亚等地区农业劳动力转移的状况做了介绍。

整体上来说，我们现有的研究成果已经认识到农业生产率是否得到提高、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和农业发展的模式以及对教育的投入对于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顺利转移都是至关重要的。但问题是亚洲和拉美都采用了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和促进工业化发展的措施，而且政府都非常重视对教育的投入，为何还是出现了这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呢？如果说工业和农业的发展模式是导致农业劳动力是否可以顺利转移的一个条件，那么为何都在同一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和全球化背景下发展的拉美和亚洲采用了不同的工业化道路和农业发展模式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个地区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同重视程度呢？而且两个地区选择了不同的工业化和农业模式是纯粹的偶然还是必然？还有农业和工业化的模式的综合机制对劳动力的转移造

成什么影响，并进而如何影响经济和社会发展呢？

因此对目前农业劳动力转移的作用机制对于经济的影响方面的国际研究以及基于社会制度与文化背景的延伸研究仍然比较少；而且研究的方面也主要集中于失业冲击和收入影响方面，而对于劳动力转移的机制没有实证研究；因此对农业劳动力转移的机制以及对经济的影响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意义。

二、文化背景决定工业发展模式的选择与劳动力转移效果

1. 劳动生产率、工业化模式和劳动力转移

传统的研究认为是工业化的模式决定了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结果：成功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早期是以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比如早期的日本、东亚“四小龙”的发展都是在工业化的初期首先采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相反失败的经济体往往在工业化的初期就采用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模式，比如拉美国家和部分非洲国家。对此我们传统的研究已经有比较成熟的论证和论据来说明这点了。

但问题是究竟什么因素让东亚选择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而让拉美选择了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呢？传统的研究主要注意到了一些经济因素对于这种选择的影响，比如投资的主体以及资本的来源主要是来自国内还是国外：东亚早期的发展在资本来源上主要强调自己积累，而拉美早期的发展主要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东亚在早期用于投资的资本也就并不怎么充足，更强调劳动投入对于增加生产率的作用，因而也就首先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但拉美的工业投资主导是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因而更强调资本密集型的产业。但问题是为何拉美在发展的早期不像亚洲那样强调自己积累，或者说东亚在发展的早期又为何如此强调自己积累而不像拉美那样直接以外国投资为主导呢？

① 世界银行把东亚经济的快速发展称为“东亚奇迹”。

林毅夫、蔡 等人提出东亚、南亚和拉美包括中国是基于各自的比较优势发展起不同的工业模式的，显然东亚有劳动力丰富、价格便宜的比较优势^[10]。但问题是很多国家比如印度、墨西哥、巴西，甚至非洲国家同样存在这种“比较优势”，但显然印度、墨西哥没有东亚和中国那样明显的劳动密集型部门，软件、汽车零部件、医药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占据了印度很大的出口份额^[11]。

看来单纯的经济因素不能完全解释这个问题，文化的背景 and 不同文明间的差异可能是造成这种结果的本质原因之一，也就是说文化背景和价值观的不同影响了拉美与东亚在工业化模式上选择的不同。

与印度与拉美相比，东亚和中国人更勤劳，这种文化传统让中国和东亚各国在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上更有优势，因而东亚和中国首先发展的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无论是早期的日本还是后来中国内地和“四小龙”。这样在西方产业升级的时候，劳动密集型资本加速从发达国家向东亚发展中国家进行转移，东亚很快成为全球制造产业链的一部分。这又反过来促进了中国和东亚的出口贸易，发展起出口导向的企业。在日本工业初期吸收的劳动力的总数中，由劳动替代资本的创新吸收的劳动力所占比重为 80%，而由资本积累吸收的劳动力所占的比重仅为 20%^[12]。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经济起飞的初期也都实行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重点的工业发展战略。例如，20 世纪 60 年代和 70 年代，台湾抓住国际市场的机会，大力发展纺织品、合成板，以及电子、成衣、家具、鞋类、塑胶、家电等一大批劳动密集型产业，使岛内的失业率由 50 年代的 7%，下降到 70 年代末的 1.2%，农业劳动力转移的速度，也由 50 年代的 4% 提高到 60~70 年代的 6%^[13]。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为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顺利转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吸收了大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因而东亚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并没有出现比较严重的问题。

拉美同期同样经历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快速转移过程，农村人口在短时间内以爆炸性

速度流入城市^[14]。但与东亚和中国不同，拉美的文化在传统上不重视劳动，即使是普通的体力劳动的参与意识也是缺乏的；在初等劳动领域，我们经常看到中国的普通农民和工人远赴非洲和拉美参与各种工程的建设，却很少看到当地的劳动力参与。因而拉美要提高生产率的话就不可能像亚洲那样通过简单的追加劳动而实现，只能追加资本投入，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显然也就不得不首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在工业化的道路上也就选择了规模化和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发展道路。同时由于劳动的竞争力比较低，拉美在早期与东亚、后期与中国争夺世界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本的转移方面明显处于劣势。由于资本密集型的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较少，这样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就无法顺利地向工业部门转移，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和发展问题。

2. 储蓄率、工业化模式和劳动力转移

有人提出拉美选择资本密集型的工业化模式的另外一个因素是拉美的投资主要来自发达国家，因而更强调资本的投入；而东亚早期的发展国内积累非常重要，因而更强调劳动投入。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知道资本形成的其中一个最为重要的因素是储蓄的水平，储蓄可以最终通过投资转化为资本。东亚国家普遍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勤俭节约是儒家文化的一个重要传统。因此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东亚各个国家的储蓄率普遍比较高，进而转化为比较高的投资率。在 20 世纪 80 年代，韩国、中国台湾地区、新加坡、马来西亚，以及中国的内地都保持着高达 40% 以上的储蓄率，日本在战后发展的初期也大体是这个水平，这种极高的储蓄率带来的是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投资率。即使今天中国的储蓄率仍然是国内收入的 40% 以上，大约是南亚、拉美和非洲的 2 到 3 倍^[15]。

而拉美、南亚和非洲则主要受欧洲殖民主义文化的影响，偏重消费。拉美、南亚和非洲的这种文化遗产导致储蓄率偏低，无法形成发展必须的有效资本^[16]。尽管拉美各国债务累累，但始终有一种模仿发达国家的过度消费

倾向。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指出：拉美缺乏俭朴精神，存在一个特权消费阶层^[17]！这种文化遗产导致在拉美国家储蓄率偏低，80年代初大部分国家只有22%左右，仅仅为东亚的一半。极低的储蓄与投资率使得拉美和非洲的发展过分依赖外债，而沉重的外债引发的经济危机使储蓄率进一步降低，从而陷入发展的恶性循环。因而拉美也就不可能像东亚那样在经济发展的早期以自己积累为主，而不得不依赖外国主导的投资模式，发展的也就是资本密集型的产业。

综上所述，因此拉美和东亚发展的结果以及劳动力转移效果差异的一个表面原因是经济发展早期所选择的工业化模式的不同造成的，而这种选择的一个表面原因看似因为投资的来源、劳动力资源的比较优势不同等经济因素，但实际是文化的背景带来的劳动生产率和储蓄率的差异造成的。

三、文化背景决定农业生产率、农业发展模式与劳动力转移

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和农业生产率的高低也是劳动力转移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因素，这也是以前的研究普遍证明了的。但为何拉美不像亚洲这样重视农业？并且与亚洲选择了不同的农业发展模式呢？

东亚国家普遍重视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率先得到提高，在农业生产率提高模式上，东亚主要通过追加劳动，而拉美主要通过追加资本投入。同时在东亚文化传统上，土地平均化往往是政府取悦于民、维持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措施，这样东亚各国在战后普遍进行了有效的土地改革，以便“耕者有其田”，土地的改革以及强调劳动投入的农业发展模式使得东亚各国的农业生产率在资本投入较低，仅依靠劳动增加的情况下仍然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战后，日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加快，但土地集中程度相对低于欧美发达国家，农业兼业经营普遍，吸收了一定的劳动力；台湾同样重视农业的发展。这种农业模式在工业化的初期本身就安置了大量的劳动力，避免了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快速流向城市，从而形成了一种稳步

的劳动力转移过程^[18]。

而同样由于文化的影响，拉美在农业发展中不得不采用以外国投资为主导的规模化的农业发展模式。农场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土地越来越集中。规模化的农业生产无法安置大量的劳动力，导致大量农业劳动力在工业化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情况下“提前”进入城市，进一步导致过度的城市化，并进而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在巴西土地制度的最大特点是土地高度集中，巴西占地1000公顷以上的农户仅占农户总数的1%，但他们却占有全国45.1%的土地面积。在投资上，拉美的农业同样以西方资本作为投资主导，美国农业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有3/4集中在拉丁美洲。有人提出拉美的自然和土地资源相对于东亚丰富，这是导致农业规模化的原因，但很多国家比如墨西哥和巴西同样人口密集，但也没有实行土地改革和率先发展农业的模式。反过来，如果说亚洲的改革是基于劳动力丰富而土地相对较少的经济基础，那么印度作为一个劳动力大国，在发展农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同样进展缓慢^[19]。

可见是文化因素决定了对农业的重视程度和发展模式，从而带来劳动力转移的差异。韩国也是说明这点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亚洲韩国是个例外，虽然受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但韩国在战后“去中国化”的倾向相当严重，喜欢在西方的思维模式下看待一切问题。因而在劳动力转移方面，韩国也选择了西方的忽视农业发展、劳动力集中转移的方式。与此相应的结果是，韩国的中小城市以及农村非农产业不发达，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涌向工业发达的大城市，造成了交通拥挤、住房紧张、污染严重等“大城市病”。尽管中国传统文化同样影响了韩国，但韩国却并没有采用与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相同的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反而同样出现了类似于拉美的城市化问题，尽管没有那么严重^[20]。

四、文化背景对教育发展与劳动力的转移
农业劳动力的素质低下是制约劳动力转移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不同的文明中对教育的

看法和价值观念对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具有重要意义。教育水平的提高让农村劳动力更适应工业化的要求,为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技术在迅速更新,而受过教育的工人可以不断的学习新技术,在生产过程中起到一个技术学习和创造的作用,这本身就可以产生更大的生产力,因此教育也是发展中国家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一个必备的前提,如何提高农业劳动力的素质是劳动力转移成功与否的一个关键,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就是教育。教育是人力资本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这方面,杰斯(Jess Benhabib)和马克(Mark M. Spiegel)等做了详细的分析,人力资本的投入对于增长的贡献有显著的作用^[21]。

显然,儒家文化传统下的东亚国家更重视教育,从而促进了东亚国家劳动力素质的极大提高。但从教育经费占GNP的比重来看,主要的东亚和拉美国家基本保持了相同的教育投入水平。单纯地从这点来说,很难说拉美国家不重视教育。但教育投入的方式决定了教育的效果,东亚主要是私人投入,而拉美主要是政府投入。萨卡(Psacharopoulos)和乔治(George)比较了不同的教育投入方式造成的对于教育收益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私人教育投资收益率比社会教育投资收益率高很多^[22]。一些研究东亚发展模式的学者在论及东亚的教育成就时认为,成就的取得在相当程度上是儒教影响的结果,韩国学生读书的费用主要由家庭负担。中国大体也是这个情况:在义务教育期间,尽管中国存在非常不合理的教育乱收费,但重视教育的传统仍然让中国家庭收入的相当部分投入子女的教育上,在1995年的时候,中国的小学入学率就已经几乎达到100%,中学入学率也达到75%^[23]。

因此一个国家教育水平的高低除取决于国家用于教育方面的公共投资外,更重要的是取决于家庭和个人在教育方面的支出,后者虽然取决于家庭和个人的收入,但文化因素对此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拉美国家在家庭对教育的投入上与东亚和中国有明显差距。家庭对于教育的投入较低,结果是带来了较高的辍学率和

留级率,教育效率大大降低。同时教育水平偏低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这些国家虽然也产生了大量的剩余农业劳动力,但由于无法适应工业化对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要求,因而无法顺利地向工业部门转移^[24]。

五、结论:避开“劳动力转移的陷阱”

尽管工业化模式、农业的发展水平以及对于教育的重视都是东亚和拉美发展结果不同的原因,但文化是决定工业化和农业发展模式以及对教育是否重视的根本因素。文化传统所带来的对于农业生产模式、工业化模式的选择以及教育的发展影响,以及随之带来的对劳动力转移的一个整体后果是:首先,鄙视劳动的传统所带来的农业生产率的低下以及土地改革的不彻底造成拉美农业不得不强调资本的投入并进行规模化经营;由于规模化的农业部门吸收的劳动力较少,这样就会产生比东亚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这些农业剩余劳动力快速的涌入城市,导致了快速而过度的城市化;但由于鄙视劳动的态度使拉美在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业化模式上与东亚相比没有优势,加之以西方投资为主导的工业化模式,因而不得不强调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从而减少劳动的投入,这样工业部门就无法吸收大量的劳动力;同时由于传统的文化使得家庭对于教育没有足够的投入,教育效率低,农业劳动力无法满足工业化对于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要求,进一步阻碍了劳动力的顺利转移。这三个因素结合起来导致了拉美劳动力尽管大量的涌入城市,却无法顺利地向工业部门转移,我们暂且把这种现象称为“劳动力转移的陷阱”。“劳动力转移的陷阱”导致大量农业剩余人口无法顺利向工业部门转移,进一步导致拉美国家贫富差距严重,这又引发了一系列的政治和社会问题,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加重了经济的衰退,从而陷入经济发展的恶性循环。因此,“劳动力转移的陷阱”是拉美发展一系列社会和发展问题的根源之一。

参考文献:

- [1] Marr, W. L and P. L. Siklos. The Link between Immigration and Unemployment in Canada. Journal of Policy Modeling,

1994, (16): 1- 26

[2] Marr, W. L and P. L. Sikks. Immigration and Unemployment: A Canadian Macroeconomic Perspective. in Diminishing Returns: The Economics of Canada's Recent Immigration Policy, edited by D. J. DeVoretz, The C. D. Howe Institute, Toronto and the Laurier Institution, Vancouver, 1995 293- 330.

[3] Laryea, S. A.. The Impact of Foreign - Born Labor on Canadian Wages: A panel Analysis. Vancouver Centre of excellence: Research on Immigration and Integration on the Metropolis (RIIM), February Working paper, 1998 98- 106

[4] Feridun. Investigating the Economic Impact of Immigration on the Host Country: The Case of Norway. Prague Economic Papers, 2005, 4 350- 362.

[5] Morley, B. Causality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Immigration: An ARDL Bounds Testing Approach. Economics Letters, 2006, 90 72- 76.

[6] Zeigler. Implementing Welfare Reform: A State Report Card. Policy Analysis,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4, 529

[7] Lieberman, Shaw. Looking Inward, Looking Outward: The Politics of State Welfare Innovation under Devolution.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00, 53 (2): 215- 240

[8] 李仙娥, 王春艳. 国外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比较. 中国农村经济 [J], 2004, (5).

[9] 姚程. 亚洲国家或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比较与借鉴. 农业与技术 [J], 2006, (4).

[10] 林毅夫, 蔡 . 比较优势与发展战略——对“东亚奇

迹”的再解释. 中国社会科学 [J], 1999, (5).

[11] 普拉纳布·巴丹. 觉醒的“泥足巨人”: 中印比较. 吴敬琏. 比较 33 [C].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7.

[12] 同 [8].

[13] 同 [9].

[14] 孙鸿志. 应吸取拉美国家城市化的教训. 经济纵横 [J], 2007, (8).

[15]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 1997- 2006 [R].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17- 122.

[16] 张勇. 社会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因素. 经济问题探索 [J], 2008, (1).

[17] 劳尔·普雷维什. 外国资本主义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53- 54.

[18] 同 [9].

[19] 同 [8].

[20] 同 [9].

[21] Jess Benhabib, Mark M. Spiegel. The role of human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ggregate cross.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4 [J], 1994. 158- 161.

[22] Psacharopoulos, George. The 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 to Economic Growth: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The Economic Value of Education edited by Mark Blaug VT” [M]. USA: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1992. 60- 335.

[23] 世界银行. 世界发展报告 1996 [R].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7. 17- 122.

[24] 同 [22].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 78 页)

建立与户籍人口接轨的循序渐进的福利保障政策; (6) 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宜分类分层次。循序渐进推进。

三、会议总结

国家人口计生委国际合作司副司长胡宏桃在总结发言中指出: 党的十七大高度关注民生问题, 这给家庭福利政策的研究提出了非常严肃的命题与任务。本次会议的三个主要议题 (即家庭变化, 社会保障和流动人口) 是中国当前社会新问题当中的突出问题, 也是世界其他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作为亚太经社会

的成员之一, 中国会一如既往地积极参与, 期待与其他国家加强交流与合作。

亚太经社会新出现社会问题司处长大崎敬子女士指出: 这次研讨会是在亚太地区传统家庭快速转型背景下进行的, 通过对中国在全球化、老龄化和城市化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进行深入讨论, 对于促进中国乃至亚太地区社会服务与家庭福利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本次研讨会提出的相关建议将纳入即将在澳门召开的亚太经社会区域会议行动框架之中。她希望今后不断加强各方在研究和项目上的合作。

[责任编辑 童玉芬]